

## 中国非洲问题的“智库研究”： 历程、成效和问题

张宏明

**内容提要** 中国对非洲问题的“智库研究”肇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尽管当时在中国尚无智库和“智库研究”的概念，但是中国对非洲问题的动态研究或对策研究自起步之日起便带有明显的“智库研究”的特征，而从事非洲问题动态或对策研究的科研机构实际上也扮演着智库的角色、发挥着智库的功能。中国非洲问题“智库研究”60年的行进轨迹大致经历了起步、徘徊与勃兴3个阶段。鉴于中国非洲问题“智库研究”系由官方需求驱动并且始终受到需求导向之影响，因此其兴衰或起伏不仅反映了中国对非政策的演化轨迹以及中非关系的发展脉络和时代特征，而且也折射出不同时期非洲在中国外交或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变化。进入21世纪，中国非洲问题“智库研究”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不过按照“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新要求，目前仍处于探索阶段，其前行之路亦非坦途。对中国非洲问题“智库研究”发展脉络的梳理，意在厘清一些基本问题并对已经或正在做的一些工作的实际效果做一阶段性评估，以使今后前行的步伐迈得更扎实。毋庸讳言，受到体制、机制等因素的制约，中国非洲问题“智库研究”的现实境况和发展前景还面临着诸多科研机构自身在短期内难以解决的问题或困难。

**关键词** 中国的“智库研究” 非洲问题 成效 问题

**作者简介** 张宏明，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北京 100007）。

中国“智库研究”的行进轨迹不仅有别于西方国家,即便在国内,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也同样存在着不小的差异,这在国际问题的“地区研究”<sup>①</sup>中亦有所反映,中国非洲问题“智库研究”的沿革便带有其自身的特点。中国对非洲问题“有组织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sup>②</sup>由于受到官方需求的导向作用,中国的非洲问题研究从一开始就是基于现实议题,并且是专注于“涉我的”非洲现实问题的动态研究或对策研究。这主要同当时中国的国际处境、外交战略,以及决策层对非洲形势的关注度密切相关。惟其如是,中国非洲问题的动态研究或对策研究从一开始便具有“智库研究”的特征,而从事这种研究的机构实际上也扮演着智库的角色、发挥着智库的功能。如果将这种“涉我的”动态研究或对策研究视为“智库研究”的雏形,<sup>③</sup>那么,中国非洲问题的“智库研究”大致经历了起步、徘徊与勃兴3个阶段;其时间跨度依次为: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20世纪末、进入21世纪至今。鉴于中国非洲问题“智库研究”兴衰与官方需求变化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因而,其历史沿革不仅反映了中国对非政策的演化轨迹及中非关系的发展脉络与时代特征,而且也折射出不同时期非洲在中国外交或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变化。

## 导 语

为了避免歧义或误解,在文章展开之前,有几点需要做出特别的说明:

### (一) 关于“智库研究”与学术研究的区别

“智库研究”虽然不是智库工作的全部,但无疑是其最为重要的工作内容。<sup>④</sup>较之学术研究,“智库研究”的特点可以用现实性、实用性、前瞻性和储备性加以概述。“智库研究”必定是基于现实议题,并力图解决现实问题。

---

<sup>①</sup> “地区研究”(Area studies)系指运用社会科学各学科门类的理论、方法,或以这些学科作为视角、路径,对特定国家或地区的研究。

<sup>②</sup> 关于中国非洲问题研究的发展历程,参见张宏明:《中国的非洲研究发展述要》,载《西亚非洲》2011年第5期,第3~13页;更为详细的论述,参见张宏明:《中国的非洲研究述要》,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编:《中国的中东非洲研究(1949-201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29~172页。

<sup>③</sup> 基于“历史考虑”或“行文方便”,文中有时会出现动态研究、对策研究、应用对策研究与“智库研究”交替使用或混用的现象,特此说明。

<sup>④</sup> 智库具有咨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公共外交等多重功能。

事实上，智库存在的理由就在于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智库研究”虽然基于现实议题，但是并非所有的现实问题研究均可纳入“智库研究”；因为“智库研究”所关注的并非是一般的现实问题，而是那些“涉我的”战略性、全局性、综合性的重大现实或理论问题，其中还包括一些前瞻性议题。例如，同样是研究大国与非洲关系，“智库研究”与学术研究关注的重点就不同；“智库研究”系对策研究，它不仅满足于就事论事，解答“是什么”、探讨“为什么”，而且更关注“其今后的发展趋向”、“对我有何影响”以及“我应如何应对”等。上乘的智库产品不单要给出“对策建议”，而且还要给出多套可供选择的“解决方案”。此外，“智库研究”不仅关注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现实议题，而且还对今后可能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趋势，即所谓“未来议题”进行超前预测或研判，并预先拟定多套备选方案，后者又称之为“储备性研究”。

“智库研究”与学术研究在研究手段、研究内容、研究目的、服务对象、成果形式及其评价标准等方面也存在明显的差异。现今之“学术”概念实为舶来品，意为“与学院有关”、“纯理论性”、“非实用性”或“无实际目的”等。据此，学术研究亦可称之为“学院式的”研究或“非实用性的”研究。一般而言，学术研究以梳理知识、研究“说法”为主，侧重于构建理论模型，归纳具有普遍性的客观规律，即所谓著书立说，目的是答疑解惑、推进学术前沿议题研究、传播知识。学术研究的题目一般由学者根据自己的“个人兴趣”自行择定，其成果多以学术专著特别是学术论文的“文论”形式出现，其服务对象为知识分子或一般公众。此外，学术研究讲求的是“立得住”，基于立论需要，学者大都旁征博引，且注重学术规范，为此甚至不惜“十年磨一剑”。

而“智库研究”则侧重于研究问题、分析情况，探讨“做法”，其目的性非常明确，即为了探寻解决问题的办法、提供决策咨询。有鉴于此，“智库研究”的相当一部分题目是“命题作文”，即所谓“交办任务”或“委托课题”，即便是自选题目，智库学者也需要考虑这个智库产品是为谁生产的，产出之后是否能“用得上”，否则就是等于做了“无用功”。因此，较之普通学者，智库学者更看重研究成果的转化及其在实践中发挥实际作用。“智库研究”的主要服务对象是政府或企业，其成果多以内部报告或研究报告的“策论”形式出现，注重时效性，讲求的是“用得上”。智库学者所提出的对策建

议能否引起决策者的注意并得到反馈,以及是否被吸纳、付诸实施,便成为评判智库产品“优劣、高低”的重要依据或指标。鉴于“智库研究”系对策研究,受问题导向,并服务于决策,因而智库学者除了要具有强烈而敏锐的问题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还必须具有战略思维和快速反应能力。截至目前,国内“经常性”从事非洲问题“智库研究”的科研机构或学术社团为数有限,多数科研机构或学术社团日常所从事的非洲问题研究属学术研究,而非“智库研究”,后者较之前者,不过是偶尔为之或点缀而已。

## (二) 智库与学术机构之间无高低贵贱之分

关于智库的构成要素及智库研究内涵的界定虽非本文所关注的焦点,却也是绕不开的话题。世上之事有时就是这样:虽然世人对智库的重要性大多表示认同,但是对于智库的界定却存有争议,甚至可谓见仁见智,不仅国内意见相左,国外同样也莫衷一是。毋庸讳言,虽然智库并非是什么高深的机构,但是,就如同“智库研究”有别于学术研究一样,智库毕竟不同于一般的科研机构或学术社团。换言之,一个研究机构是否是智库确实需要具备一些相应的条件,这就意味着并不是所有从事非洲现实问题研究的科研机构或学术社团都可以称之为智库。

那么,什么样的研究机构可以称之为“智库”呢?尽管因划分标准不一,有关智库的定义莫衷一是,不过,综合中外专家学者带有普遍性的观点,智库似可概述为:以独立性研究为宗旨,以政策研究为核心,以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问题研究为重点,以多学科综合研究为依托,以成果的实用化、实效化为目标,以决策咨询为服务对象,由综合素质较高的多学科、多方面的专家学者组成的组织结构相对稳定的非营利研究机构。<sup>①</sup>当然,上述智库要素有些是带有普遍性的,有些则是相对的,比如智库的独立性就是相对而言的。<sup>②</sup>

进入21世纪,特别是近年来,随着需求的增大、中央的力推,加之每年

---

<sup>①</sup> 以上只是简要罗列、描述了智库所应具备的一些基本特征、条件或要素,实际上,智库还需要具备一些其他条件或要素,其功能也是多方面的。

<sup>②</sup> 需要指出的是,鉴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中国智库特别是从事非洲问题研究的智库还有一些自身的特点。

发布的“全球智库排名报告”的推波助澜作用,<sup>①</sup> 智库的地位扶摇直上, 智库建设或智库研究亦越益成为国内学术界热议的话题。鉴于智库业已成为值得炫耀的“高级”研究机构的同义语, 一个科研机构或学术社团是否能被视为“智库”俨然成为衡量其身价高低的一杆标尺。于是乎, 越来越多的科研机构或学术社团纷纷提出要向智库转型, 甚至自诩为“智库”。这既反映出学界、学人在对智库功能定位认知的模糊, 同时也折射出近年来学术界的浮躁之气。

实际上, 不惟学界、学人, 即便是作为需求方的相关政府职能部门也同样对智库的功能以及自身的需求存在认知上的误区。2013年10月启动的“中非智库10+10合作伙伴计划”便是一个例证。在此次活动中, 中方有8家从事非洲问题研究的科研机构或学术社团获准作为中方“智库”<sup>②</sup> 入围, 与8家非洲“智库”建立“一对一”合作伙伴关系。诚然, 此举对于促进中非研究机构交流的机制化和常态化、提升中非学术交流与合作的水平、深化中非人文交流的内涵, 无疑是大有裨益的。不过, 与此同时, 国人对中国非洲问题“智库研究”(且不说智库建设)的现状也要有客观、清醒的认识。因为按照智库构成要素的一般标准, 一些被冠以“智库”的科研机构或学术社团并非名副其实。这种“自我智库化”或“被智库化”现象至少还反映出国人对智库的属性、功能以及从事“智库研究”所应必备的要件等尚不十分明晰, 甚至混淆了智库与学术机构、咨询公司之间的边界或差异。

客观地讲, 目前国内从事非洲问题研究的科研机构或学术社团能名副其实地称之为智库的为数不多, 多数机构尚处于从学术研究向“智库研究”转型的过程中, 即便笔者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也仍处于这一进程之中。“智库研究”转型时间的长短取决于各个科研机构或学术社团的“意愿”, 因为并非所有的科研机构或学术社团都愿意转型。在学者的潜意识中或单纯从做学问角度而言, 真正能够留下来的或传世的, 还是那些经过时间和学术积淀的学术著述, 而非“短平快”的各类研究报告。因此学术机构

---

<sup>①</sup> 由詹姆斯·麦甘(James G. McGann)领衔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和公民社会”研究项目于2007年发表首份全球智库排名报告, 之后每年发布, 目前该报告已成为衡量各国智库水平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

<sup>②</sup> 这8家单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外交学院非洲研究中心、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和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

向智库转型,对学者来说是要付出“代价”的,毕竟“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简言之,较之学术机构,智库既不神秘也不高端。如同“智库研究”与学术研究是两种不同的研究一样,智库与学术机构之间同样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它们之间的区别仅仅是功能定位不同而已。因此,我们对智库既不宜仰视,亦不宜俯视,而应采取平视的态度;对于自身所在的研究机构是否是智库,我们同样也应持一种平常心,大可不必为之纠结、劳心。

### (三) 关于“论题”和其他事项的说明

之所以选择“智库研究”而非智库本身作为文章的论题,主要是基于中国非洲问题研究机构及其从事的科研活动的“历史与现实”:一方面,现代意义上的智库概念引入我国的时间不长,如果上文关于智库的构成要素成立的话,那么以此作为参考系,时下国内从事非洲问题研究的科研机构或学术社团离真正意义上的智库还相距甚远。截至目前,国内非洲学界的“智库建设”仍处于摸索阶段,即便是那些长期从事非洲问题应用对策研究的科研机构,也依然难能发挥智库所应有的全部功能。另一方面,时下虽然有些作为“母体”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本身堪称智库,但从事非洲研究的科研人员所占比例很小,不过是作为一个“拼盘”点缀其中而已。国内更多的从事非洲问题研究的科研机构或学术社团虽然本身不是智库,但它们却或多或少地从事着具有智库性质的工作,即“智库研究”,因而选择“智库研究”而非“智库”作为论题,更贴近中国非洲问题研究机构的实际。

本文资讯的采集工作,一则是基于笔者平时的观察,自1982年至今笔者始终从事非洲问题研究工作,对业内的情况有所了解;另则,笔者通过相关形式做了一些专门调研或摸查,诸如,近年来对国内主要非洲问题研究机构的走访及与主要从事非洲问题应用对策研究机构相关人士的座谈等。<sup>①</sup>

本文的撰写难度是如何在“不泄密”的前提下,全面而客观地反映中国非洲问题“智库研究”的真实情况;在这方面尺度的拿捏难度,远比笔者想

---

<sup>①</sup> 2015年3月19日,笔者邀请了国内几家从事非洲问题应用对策的科研机构就中国非洲问题的“智库研究”问题在西亚非洲研究所举行座谈,来自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徐伟忠、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的金锐、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的王洪一与会;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张春和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的罗建波则以“通讯”方式间接参与(即以书面笔答方式回复笔者列举的8个问题)。上述专家学者就其所在单位非洲问题智库研究的发展脉络、人员构成、科研组织形态、选题来源、报送渠道、服务对象、成效与问题,以及今后一个时期国内非洲问题研究机构的智库建设或智库研究等情况交换了意见。

象的要大。原因在于，在智库建设特别是“智库研究”方面，国内从事非洲问题研究的各个科研机构或学术社团的进展或做法不尽相同，限于篇幅，难以一一陈述。加之，有些科研机构或学术社团的“说法”与“做法”之间距离较大，或是说得多、做得少，或是说得比做得好，甚或只说不做。另则，还有些科研机构基于保密制度方面的考虑，不能或不愿将其做法公之于众。以“智库研究”的成果为例，鉴于政策研究或决策咨询类成果一般均以内部报告的形式提交，有些还涉密，因此，笔者难以对整个非洲学界的这部分“智库产品”做出全面或系统的统计。加之，笔者在调研过程中与相关科研机构的相关人士之间有“所谈之事不予公开”的事先约定或承诺，有鉴于此，笔者只得做了“技术性”处理，即在涉及智库建设或智库研究方面情况的实例时，仅以笔者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为案例。在这种情况下，本文挂一漏万、以偏概全便在所难免，疏漏或不当之处，尚祈学界同仁斧正。

另则，关于目前中国非洲问题智库建设特别是“智库研究”面临的困难和问题，限于篇幅，本文仅罗列现象，不做展开分析。关于中国非洲问题智库建设特别是“智库研究”的前景与出路，笔者另有专文论述。

## 中国非洲问题“智库研究”的缘起

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是中国“有组织的”非洲问题学术研究的起步阶段，同时也是非洲问题“智库研究”的孕育时期。虽然学术研究和“智库研究”是中国非洲问题研究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但是鉴于中国“有组织的”非洲问题研究的缘起首先并且主要是官方对“智库产品”的需求驱动所致，因此从时序上说，注重“策论”的“智库研究”要比侧重于“文论”的学术研究起步更早，也更受到官方的重视。虽然在这一时期中国还没有出现智库和“智库研究”的概念，国内早期从事非洲问题动态研究或对策研究的科研机构及其所从事的研究工作也并不充分具备现代意义上的智库和“智库研究”的全部功能或特征，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它已经蕴含了智库和“智库研究”的主要功能或特征。也正是基于这一点，这一时期可以被视为中国非洲问题“智库研究”的起步阶段。

### （一）中国非洲问题“智库研究”的缘起

就目前掌握的资料或文献资料而言，截至1955年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召开之时，中国对非政策的决策过程尚无学界的参与，实际上，国内也不存在从事非洲问题研究的科研机构，包括非洲问题研究本身也是由政府职能部门直接担当的。例如，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亚非会议准备工作的一部分，外交部编撰了《非洲概况》和《亚非问题参考资料》。但是，万隆会议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当时陆续成立了一些从事非洲问题研究的科研机构。这一时期国内从事非洲问题研究的科研机构有5家，<sup>①</sup>但真正专注于非洲现实问题动态研究或对策研究的先后有过两家，<sup>②</sup>最先从事此项工作的是中国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sup>③</sup>8个地区研究组之一的“西亚非洲研究组”。当1960年由4人组成的“西亚非洲研究组”整体被并入筹建中的中国科学院亚非研究所<sup>④</sup>之后，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国内只有一家科研机构专事非洲现实问题的动态研究或对策研究。

之所以说早期从事非洲问题动态研究或对策研究的科研机构发挥着“智库”的作用，其科研工作具有“智库研究”的特征，一方面是基于科研机构的角色定位或功能定位方面的考虑，另一方面是基于其科研工作特别是科研成果的目的、用途而言的。而这两者又与中国的国家性质、中国当时的国际处境、外交战略存在着关联性。

#### 1. 关于相关科研机构的角色定位

中国非洲问题动态研究或对策研究被提上议事日程系由官方需求驱动所致，甚至可以说是国家意志见诸行政行为之结果，这在相关科研机构孕生的背景和过程中体现得非常明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便奉行“一边倒”

① 为了尊重历史，本文涉及的机构，均用其在当时的称谓，但会在注释中陈述其沿革轨迹。

② 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1964年成立）虽然也关注现实问题，但它更多地是基于学术视角而非政策视角，并且就地域而言，主要侧重于南亚和东亚地区研究，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其在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中得到印证。北京大学历史系的亚非史教研室、南京大学非洲经济地理研究室（1964年成立）和湘潭大学非洲问题研究室（1978年成立）则分别侧重于非洲历史、地理研究。

③ 国际关系研究所创建于1956年11月24日，对外称“中国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但它隶属于外交部，1958年改称“国际关系研究所”，1986年12月更名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关于国际关系研究所成立的具体过程，详见马振岗主编：《五十载春秋——纪念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成立50周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内部发行），2006年，第2、38-40页。

④ 中国科学院亚非研究所成立于1961年7月4日，1964年10月30日更名为中国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1981年由中共中央联络部划归中国社会科学院后，更名为中国社会科学西亚非洲研究所。



的外交政策，国际处境孤立。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关系从意识形态分歧逐步转化为国家利益冲突之后，中国外交便处于“两面开弓”的窘境，亟需打开外交局面。而此时恰逢非洲民族独立运动高涨，一批非洲国家相继赢得政治独立。为了支持非洲民族独立运动及建立与新生非洲国家的联系，中国的决策层亟需了解非洲的基本情况。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早期从事非洲问题应用对策研究的科研机构应运而生。

鉴于中国的国家性质和当时特定的时空背景，成立一个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科研机构是要惊动最高决策层的。1956年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便是经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批示并经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圈阅批准而成立的。<sup>①</sup>中国科学院亚非研究所的组建过程同样颇具传奇色彩：1959年9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委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1955年成立，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组成“建所筹备小组”，负责筹建工作的上级单位有3个：中共中央宣传部（当时负责管理全国文教、科研系统的干部）主管干部调配；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主管业务；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管行政；具体筹备工作由“学部”负责。<sup>②</sup>1961年4月27日，毛泽东主席在会见非洲外宾时讲道：“我们对于非洲的情况，就我来说，不算清楚。应该搞个非洲研究所。”<sup>③</sup>毛泽东主席的这番谈话，是促使处于筹建中的亚非研究所建所步伐加快的一个重要因素。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科学院亚非研究所的筹建工作虽然历时近两年，但基于官方需求，实际上是边筹建、边工作。

中国非洲问题动态研究或对策研究的缘起系由官方需求驱动所致，这一点还可以从相关中央文件中得到印证。1963年冬，周恩来总理在出访亚非14国前夕曾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专门商讨国际问题研究工作，会后由中央外事工作小组向中央提交的《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明确指出，随着国际外交活动的开展，国际问题研究远远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该《报告》还列举了当时国际问题研究工作的5项不足，诸如专门的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

<sup>①</sup> 详见马振岗主编：前引书，第2页。

<sup>②</sup> 关于亚非研究所的筹建过程，详见张宏明：《中国的非洲研究发展述要》，载《西亚非洲》2011年第5期，第3~4页。

<sup>③</sup> 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版，第465页。

太少、方针任务不明确、整个国际问题研究工作缺乏统一指导和部署、研究机构和实际工作部门缺乏交流与协作等，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8项改进措施，其中包括：加强并新建一批独立的研究机构，成立国际问题研究指导小组，采取“动静结合，内外交流”的办法加强实际工作部门与研究机构之间的协作等。同年12月30日，毛泽东主席审阅并批复了这份报告，随后将这份报告连同毛泽东主席的批语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3〕866号）转发全国。<sup>①</sup>

鉴于中国非洲问题动态研究或对策研究的缘起本身就是基于官方需求，加之相关科研机构同样也是在决策层直接过问下设立的，这就注定了中国早期从事非洲现实问题研究的科研机构“研以致用”的角色定位。这一点在相关科研机构的办所方针中亦得到充分体现。实际上，组建包括非洲问题在内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的初衷就是为了配合国家外交工作的实际需求。因此，经中央批准，中国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办所方针明确载明：科研工作“既不要为应付日常的任务而妨碍系统的科学研究，也不要进行脱离实际的‘学院式’研究，而要结合我国外交斗争和国际活动的意图，从中国出发，有目的地开展国际问题的科学研究工作。”<sup>②</sup>同样，根据中央批复，中国科学院亚非研究所在办所方针中亦强调：要“根据党和政府开展西亚非洲地区工作的需要，有计划地、有重点地、系统地调查研究西亚非洲各国的现状和历史”，“并以研究该地区的重大现实问题为主，”“同时，配合外交工作，在接待非洲外宾和出访非洲等方面，提供研究材料和研究成果”，“为中央对中东非洲地区的重大决策服务”。<sup>③</sup>从上述科研机构的工作性质和服务对象来看，其角色定位或工作重心是非常明确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当好党和政府的思想库、智囊团。

## 2. 关于相关科研机构的功能定位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国内从事非洲问题动态研究或对策研究的机

---

<sup>①</sup> 《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内容，笔者引述了北京大学前国际政治系主任、北大亚非研究所第二任所长赵宝煦教授2004年6月5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40周年庆典上的发言：《关于加强外国问题研究的一点史料》，载《国际政治研究》2004年第3期，第142~143页。

<sup>②</sup> 马振岗主编：前引书，第43页。

<sup>③</sup> 中国科学院亚非研究所1961年成立时，1964年更名为中国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时及1978年研究所恢复工作后的办所方针的确切表述，详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所史》编写组编撰的《西亚非洲研究所40年（1961-2001）》（征求意见稿），2001年6月内部印刷，第8~10页。

构只有中国科学院亚非研究所。当时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围绕党和国家对非工作的重心，研究工作的目的不是“为了学术”，而是“为了政策”，用现在的话说，是从事政策研究、提供决策咨询，并且是“研以致用”，科研工作直接服务于国家对非工作的需要。根据中央批复的办所方针，研究所的主要任务是：“调查、搜集、整理和分析、研究西亚非洲各国的基本情况（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历史等），阶级关系及其变动，各国革命运动情况，特别是它们发生和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重大革命事件的经验教训等；研究美、英、法、联邦德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对西亚非洲的殖民政策和侵略活动；研究现代修正主义对西亚非洲的政策、言论和活动；向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有关机构提供以上各方面、经过分析和研究的资料或著述。”<sup>①</sup>

现在看来，上述研究所“主要任务”原汁原味的表述或许有些不合时宜，但这一“历史产物”与“办所方针”一样，同样堪称是“时代气息”与“中国特色”的完美结合。更为重要的是，上述“主要任务”也恰恰是当时中央政府及其领导人在对非工作中最为关注的问题，因而理当成为研究所科研工作之重心。

现实问题研究始终是这一时期中国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工作的重心，并且特别注重现实问题的动态研究和对策研究。当时研究所从事这方面工作也有一些便利的条件：由于工作关系或个人经历，这一时期研究所的主要负责人得以与中央领导层保持接触，能够及时了解、掌握领导层对非工作的意图，并结合研究所工作的实际，围绕“涉我的”非洲热点问题经常性地召开一些形势“务虚会”，及时向科研人员传达或通报领导人的意图，同时布置下一阶段的科研工作。此外，在科研组织结构方面，为了适应动态调研的特点和需要，研究所的基层科研单位也不是按照学科设置，而是采取“分兵把口”的方式。截至20世纪70年代末，科研组织形式仍与非洲东南西北中五大自然地理区域相对应设置了5个研究室。<sup>②</sup>此外，每个科研人员均要跟踪一两个研究对象国。

关于研究所的“智库”功能定位，还可以从科研任务来源及其成果形式

---

<sup>①</sup> 中国科学院亚非研究所1961年成立时的办所方针和任务及1964年更名为中国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时的办所方针和任务的确切表述，详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所史》编写组编：前引书，第8~9页。

<sup>②</sup>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所史》编写组编：前引书，第34页。

中略见一斑。基于官方需求及“制度性”安排，研究所这一时期的主要工作是向上报送“材料”，其中的一部分系上面的“交办任务”，即“命题作文”。其成果基本上是以研究报告或内部报告的形式出现的，这类成果为数众多，涵盖范围也十分广泛，几乎囊括了“涉我的”非洲主要问题、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sup>①</sup> 这类研究成果部分刊载在类似于现在的“要报”的《亚非资料》<sup>②</sup>、《西亚非洲情况》<sup>③</sup>、《西亚非洲参考资料》<sup>④</sup>、《非洲动态》<sup>⑤</sup>等内部刊物上，还有一部分直接报送党和国家领导人或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当然，研究所也做一些非洲问题的基础研究工作，不过即便如此，其目的不在研究文本、梳理知识、传播知识，而系为研究情况、梳理问题、服务官方。例如，《非洲手册》可谓是毛泽东主席钦定的课题，<sup>⑥</sup>为周恩来总理出访非洲提供了参考并博得其赞誉。<sup>⑦</sup>

## （二）中国早期非洲问题“智库研究”的特征与问题

在中国国际问题的“智库研究”中，较之其他“地区研究”，非洲问题的“智库研究”起步当属比较早的。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为例，在其国际学部的8个研究所中，除了西亚非洲研究所、拉丁美洲研究所、苏联东欧研究所（现为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和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之外，其余4个研究所——美国研究所、日本研究所、西欧研究所（现为欧洲研究所）和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现为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则是在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80年代成立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受到西方国家的孤立，除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亚洲一些国家之外，非洲是中国外交的重要活动场所。这一时期也是非洲在中国外交战略中较为受重视的一段时期：非洲不仅作为亚非拉的一部分进入了中国决策者的战略视野，

① 张宏明：《中国的非洲研究发展述要》，载《西亚非洲》2011年第5期，第5页。

② 《亚非资料》于1960年开始试编，内部发行，每期约5万字，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的前身亚非研究所办，1965年更名为《西亚非洲资料》，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停刊，“文革”后复刊。

③ 《西亚非洲情况》于1964年创刊，系月刊，内部发行，每期约6万字，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的前身西亚非洲研究所办，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停刊。

④ 《西亚非洲参考资料》为不定期油印本刊物，字数不固定，发送200份，供有关部门内部参考。

⑤ 《非洲动态》于1973年由中联部创刊，不定期内部刊物，至1980年底共出刊197期。

⑥ 毛泽东主席讲话的原文，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版，第465页。

⑦ 中国科学院亚非研究所1961年成立时的办所方针及1964年更名为中国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时的办所方针的确切表述，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所史》编写组编：前引书，第10页。

而且成为毛泽东主席“两个中间地带”理论及“三个世界划分”战略构想的重要依托。应当说，这一时期中国非洲问题“智库研究”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和“中国特色”，同时也毋庸讳言，上述特点也使其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局限性。

#### 1. 中国早期非洲问题“智库研究”的特点

由于受到中国的国家性质、政治意识形态取向以及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决策层的国际战略构想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国内早期非洲问题“智库研究”不仅具有“时代的印记”，同时也被烫上了“中国的烙印”。

其一是具有鲜明的政治意识形态取向。鉴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发展对非关系主要是基于政治和外交考量而非经济利益，并且基于官方需求之轻重缓急，因此这一时期中国非洲问题的动态研究和对策研究主要是根据当时国际环境的变化、非洲形势的特点及中国的外交需要，以跟踪研究非洲地区和国家重大热点问题和突发事件为主。研究工作的主脉是：非洲民族独立运动（包括兴起的原因、过程、重大事件、发展规律、趋势、特点，以及民族主义思潮和政党等）、非洲独立国家的基本情况（包括政治形势、经济状况、民族结构、社会阶级、历史、地理等），以及非洲与大国关系特别是大国对非政策等。此外，这一时期的科研工作比较注重国别研究、专题调研；研究成果多系集体合作的产物，不鼓励学者个人公开发表署名文章或独立出版著作。<sup>①</sup>

其二是具有浓厚的官方背景。中国从事非洲问题动态研究或对策研究的科研机构从一开始就由官办的研究机构主导，并且这种状况基本上一直延续至今。中国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亚非研究所只是对外称谓，实际上它们分别是由外交部、中联部与中国科学院双重管理。也正是这种关系，使得科研机构与政府职能部门、驻非洲国家使馆保持着比较畅通的联系渠道。科研工作直接服务于国家对非工作的需要，研究成果多以内部报告形式直接上报中央。也正是基于这种官方背景，科研机构的科研工作能够“搭住脉”并“接地气”。而能否及时了解决策层的意图并掌握研究对象的形势变化，这对于从事对策研究和决策咨询是非常重要的，甚至可谓是从事“智库研究”所不可或缺的条件。在当时特定的背景下，特别是在资讯不发达的年

<sup>①</sup> 张宏明：《中国的非洲研究发展述要》，载《西亚非洲》2011年第5期，第5页。

代,如果没有国家投入,没有与政府职能部门、中国驻非洲国家使馆等前方与后方的沟通管道,非洲现实问题的对策性研究是很难开展的。中国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之所以能够从事非洲问题的动态研究和对策研究,原因就在于它占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也正是基于官方需求,即便在“文革”时期,国内关于非洲问题的动态调研也只是停顿了几年。从1971年起,中国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的业务骨干便被陆续抽调回中联部从事“内参”《非洲动态》的编写工作。

## 2. 中国早期非洲问题“智库研究”的局限性

毋庸讳言,按照现代意义上“智库研究”的标准来衡量,这一时期中国非洲问题动态研究或对策研究尚处于“智库研究”的摸索或起步阶段,其科研条件或环境也难能与时下比拟,因而存在不少的缺憾。

其一,战略性、前瞻性及理论创新方面的研究缺失。从留存下来的部分“实物”诸如《西亚非洲资料》和《非洲动态》来看,这一时期中国非洲问题动态研究或对策研究总的来说还略显稚嫩,基本上还处于摸清基本情况阶段。其突出表现是:科研工作多系动态性的跟踪研究、专题调研,主要以介绍非洲情况为主;对策研究可谓是点子多、战略思维少;研究成果在战略性、前瞻性等方面均有欠缺,储备性研究特别是理论创新更无从谈起;研究工作所涉猎的领域也比较狭窄,缺乏均衡性和系统性。究其因,主要是中国有组织的非洲研究是“另起炉灶、白手起家”,总体研究水平比较低,而人才短缺可谓是其中的致因。关于这一点,也可以从这一时期从事非洲问题动态研究或对策研究的学者的“成分构成”<sup>①</sup>中得到印证:科研人员中有些没有专业背景,也没有国际问题研究的实际经验,当时领导希望大家各尽所能、边干边学:“能写的写,能编的编,能译的译”。

其二,科研工作缺乏主观能动性,服务功能单一。鉴于科研机构的官方背景,加之由于整个科研活动均处于“保密”状态之下,因而在“做什么”、“怎么做”方面,科研机构特别是研究人员的自主意识相对欠缺,研究视野也比较狭窄。另则,较之现时智库业已多样化的功能,这一时期中国从事非洲问题动态研究或对策研究的科研机构的服务功能、服务对象单一。这也是为什么笔者倾向于将这一时期中国非洲问题的动态研究或对策研究视为中国非

<sup>①</sup>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所史》编写组编:前引书,第60页。

洲问题“智库研究”的孕育时期或起步阶段并将之称为“智库研究”雏形的缘由所在。

事实上，上述局限性不为中国非洲问题“智库研究”独有，而系当时中国国际问题“智库研究”的普遍现象。站在历史和发展的视角，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具有里程碑意义，它奠定了中国非洲问题应用对策研究的基础，进而为日后真正意义上的非洲问题“智库研究”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做了有益铺垫。

## 中国非洲问题“智库研究”何故长期徘徊不前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从事非洲问题动态研究或对策研究的科研机构数量虽略有增加，但总体而言，这一时期中国非洲问题的“智库研究”处于一种“进退维谷”、徘徊不前的蛰伏状态。当然，这种判断是比较而言的：一方面，较之这一时期国内非洲问题基础理论研究的稳步推进，应用对策研究相形见绌；另一方面则是较之此前特别是此后的应用对策研究而言。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官方需求不振无疑是其中的主要致因。上文论及中国非洲问题“智库研究”的缘起系由官方需求驱动所致并且其起伏、兴衰与官方需求变化之间是一种正相关关系。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非洲问题动态研究的服务对象还比较单一，主要面向官方，因而基本上是“买方市场”。而官方需求的变化又是与中国的国际处境以及内外政策变化密切相关的。

### （一）中国内外环境变化对非洲问题“智库研究”的影响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内外环境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一方面，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中国外交活动的重心转向西方，致使中国对非洲的政治需求减少，非洲在中国外交战略中的重要性大为降低，至少是大不如前。另一方面，在改革开放初期，非洲在中国发展战略中作用尚无足轻重，甚至还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负担”。基于轻重缓急之考虑，当时中国对外开放主要是面向发达国家，目的旨在获取国内经济发展亟需的资金和技术。坦率地讲，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中国一时还顾及不上非洲。关于这一点，亦可从中国

对非政策调整的初衷中略见一斑。<sup>①</sup>

### 1. 官方对非洲问题“智库研究”的需求

中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中国对非政策的调整，反过来又影响到了中国官方对非洲的态度，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还是非洲不再像以往那样受到中国决策层的重视。原因在于，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上半叶是中非关系转型发展的蓄势期，一方面，中国对非洲的政治需求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另一方面，非洲在中国发展战略中的作用尚未显现：中非贸易量无足轻重，中国对非投资尚未启动，中国对非援助成为这一时期中非经贸合作主要内容和形式。而那些涉及具体政策层面的事务，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内部的政策研究部门基本上可以应付或满足其日常运作的需要，凡此种种都弱化了官方对非洲问题“智库研究”的实际需求。实际上，政府职能部门似乎也没有借助科研机构科研成果的意识或需求，这一时期，政府职能部门的对非实际工作与科研机构的对非研究工作之间互不搭界，可以用“两股道上跑的车”来加以概述。

毋庸讳言，官方需求的变化或许也与中国领导人个人的兴趣、抱负存在一定的关联性。较之毛泽东，中国第二和第三代领导人更加务实，也更加专注于国内问题。加之，20世纪80年代是“非洲失去的10年”，进入90年代又陷入持续的政治动乱，中国一时在非洲难有大的作为，因而非洲自然也就难以进入其战略视野。事实上，在这一时期，除了一些涉及中国主权或尊严的重大事件，诸如除了遏制台湾“务实外交”的“反弹”斗争和国际人权斗争的需要之外，非洲能够吸引中国决策层眼球的东西也不多，甚至可以说非洲基本上已经淡出中国决策层的战略视野。诚然，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中国政府逐步加大对非工作力度，但由于科研工作自身特有的规律、周期和惯性使然，国内非洲问题研究难以在短时间内从基础理论研究重新转向应用对策研究。况且，截至20世纪末，中国的政府职能部门还没有“花钱买服务”的意识。

---

<sup>①</sup> 关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政府对非合作政策调整的时间、背景、内涵、成效及其“新政”所受到的干扰等，参见张宏明：《如何辩证地看待中国在非洲的国际处境——兼论中国何以在大国在非洲新一轮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载《西亚非洲》，2014年第4期，第20~21页。更为详细的评述，见张宏明：《中国对非洲合作政策的传承、内涵与效果》，载杨立华主编：《中国与非洲经贸合作发展总体战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3~46页。



## 2. 中国非洲问题“智库研究”的实际境况

鉴于中国非洲问题的动态研究或对策研究系由官方需求驱动所致并且始终受着需求导向的影响，非洲在中国外交战略中分量的下降，意味着官方需求的减少，后者迟早会传导到作为“供方”的相关科研机构的身上。诚然，中国非洲问题的动态研究或对策研究并未中断，从事这方面研究的科研机构甚至有所增加。不过，较之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一时期中国非洲问题的应用对策研究已是强弩之末、辉煌不再。

西亚非洲研究所在1981年1月1日由中联部划归中国社会科学院之后，科研工作的重心逐步从对非洲形势的动态研究向基础理论和应用对策研究并重的方向过渡。不过，基于“历史延续性”及科研工作的惯性，这一过渡期大致持续了10年左右，且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那些堪称是中国非洲问题第一代学人的老专家依然以国别研究为依托，继续其对非洲问题的动态研究。另则，西亚非洲研究所在划归中国社会科学院之后依然拥有一些继续从事非洲问题动态研究的条件或“资源”，例如1981年6月，根据宦乡副院长的指示，西亚非洲研究所设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片”（现称国际研究学部）机要室，供国际片各所领导和有关人员阅览外事机要文电，这对于对策研究是非常必要的。此外，西亚非洲研究所划归中国社会科学院之后，除了继续办内部刊物《西亚非洲资料》之外，还于1992年9月创办了不定期内部刊物《西亚非洲调研》，就中东和非洲地区发生的重大事件和重要问题提出看法和政策建议，供中央有关部门领导参考。截至2001年1月停刊，共出刊101期。<sup>①</sup>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西亚非洲研究所在划归中国社会科学院之后的相当长时间里依然继续从事其在中联部时期的工作，但是工作的重心已经发生了变化：以往在动态研究或对策研究中更侧重于对策研究，此后则是逐步向动态研究倾斜，<sup>②</sup> 这表明科研人员的问题意识和服务意识逐步趋淡。关于这一点，在其后来创办的《西亚非洲调研》所刊载文章的内容中亦可窥一斑。

<sup>①</sup>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所史》编写组编：前引书，第82~83页。

<sup>②</sup> 动态研究与对策研究是两个既相互关联而有不同的两个概念。这里是对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由中联部划归社科院后工作重心转移的一种描述。由于脱离中联部之后不再有“指令性任务”了，研究人员的问题意识也就逐步淡薄了，反映到科研工作之中：以往是既做动态研究也做对策研究，之后则逐步以动态研究为重了。

另则,这一时期研究所与政府职能部门基本上是各走各的路,相互之间基本上没有交集。足见,随着非洲业已淡出中国决策层的战略视野,官方需求也在下降。

这一时期从事非洲问题应用对策研究的其他科研机构,诸如隶属于外交部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隶属于外经贸部的国际贸易研究所和国际经济合作研究所<sup>①</sup>、隶属于安全部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1980年成立)<sup>②</sup>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亚非发展研究所(1994年成立),它们的境遇也好不到哪里去。上述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虽然还在开展有关非洲问题的政策研究、咨询或信息服务,但是由于“大环境”使然,其在科研力量的配备方面大多处于劣势地位。一方面,非洲研究在上述研究机构中所占的比例和分量都非常小,人员配置少则1人,多则3~4人;另一方面,鉴于这一时期非洲能够“惊动”国家决策层的研究成果不多,每年有关非洲问题对策研究的上报材料也屈指可数。

## (二) 非洲问题“智库研究”的被边缘化与自我边缘化

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非洲问题“智库研究”徘徊不前,一方面受到了国内工作重心转移、外交战略和对非政策调整等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这一时期国内官方对应用对策研究的导向特别是学术界自身的研究取向不无关系。

### 1. 非洲问题“智库研究”的“被边缘化”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内政、外交工作重心的转移也引发了科研机构业务工作重心的调整与变化。这些调整或变化反映在科研机构的应用对策研究中,突出体现在“两个优先”上:即在国内问题研究中,经济发展及与之相关的问题研究优先;在国际问题研究中,发达国家研究优先。这两种倾向遂“合力”将中国非洲问题的“智库研究”推向边缘化的境地。

这一点可以从下述具体事例中略见一斑。一方面,随着中央工作重心转向国内经济建设,基于轻重缓急,国内学术界的应用对策研究逐步侧重于与国民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学科或领域。中国社会科学院在1977年至1981年期间密集成立的工业经济研究所、农村发展研究所、财贸经济研究所、社会

<sup>①</sup> 1997年,两所合并成立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sup>②</sup> 2003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更名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下设西亚非洲研究所。其非洲研究以动态跟踪、对策研究为重点。

学研究所、人口研究所等科研机构，就是为了优先满足国内发展的决策咨询需要而采取的措施。

另一方面，在改革开放的头20年，为了获取国外的技术、资金和发展经验，中国外交重心转向发达国家。随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在研究对象及科研力量的“地域”分布上急剧向发达国家倾斜。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的8个研究所中，美国研究所、日本研究所、西欧研究所（现为欧洲研究所）便是在1981年成立的，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则是在1988年成立的。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20世纪60年代初成立的3个老所，即苏联东欧研究所（现为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拉丁美洲研究所和西亚非洲研究所的人员编制却在缩减。以西亚非洲研究所为例，其极盛时期的编制为150人，之后在几次调整中不断递减，目前核定的编制只有68人，就规模而言，已经沦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小所”。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境况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独有，事实上，其他从事应用对策研究的科研机构的情况也大致如此。例如，非洲研究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所、国际经济合作研究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等机构中不过是一个点缀，突出反映在这一时期上述机构真正从事非洲问题对策研究的只有零星几人，个别时段甚或无人顾及非洲研究。可以说，较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其他“地区研究”，这一时期中国非洲问题的动态研究或对策研究基本上处于“退缩”状态。

## 2. 非洲问题“智库研究”的“自我边缘化”

中国非洲问题研究有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之分。进入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后，随着一些新成立的研究机构的加盟，加之原有的科研机构开始有意识地走“学术路线”，国内非洲问题的基础理论研究逐步得到强化并取得长足的进展，而应用对策研究则出现了与职能部门逐渐疏离，甚或渐行渐远的倾向。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当时国内最大的非洲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工作重心的变化中略见一斑。

1981年西亚非洲研究所自中联部划归中国社会科学院后，其原有的功能定位悄然发生了变化。诚然，较之以往，同年6月经过调整后的办所方针和任务在文字表述方面似乎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现实问题研究仍然是研究所工作的重中之重，并且依旧强调“向党和国家领导机关提供对外决策的参

考或咨询性的材料”。<sup>①</sup>此后，西亚非洲研究所又先后在1988年、1992年和1993年对办所方针进行了几次调整，除了在个别文字表述上有所差异外，基本内涵大同小异。在1999年制定的《西亚非洲研究所十年事业发展规划(2001~2010)》和“十五”计划中对办所方针和任务做了如下表述：“以西亚非洲地区和国家当代政治经济发展和国际关系问题为研究重点，全面推进西亚非洲研究学科建设；同时以基础研究为依托，开展宏观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的应用研究，为我国的对外战略服务，为我国的改革开放服务，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服务。”<sup>②</sup>

但是，“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实际上，在划归中国社会科学院后，西亚非洲研究所的办所方针和任务书面表述与具体实践并非完全吻合。由于科研活动的工作周期或惯性使然，初期虽然研究人员还在继续非洲现实问题的动态研究，但实际上已经开始游走在学术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学科建设的深化及老一代科研人员的退休，科研工作的重心逐步转向基础理论研究，应用对策研究可以用“每况愈下”来加以概述。诚然，研究所在这一时期的科研工作仍然主要围绕着非洲现实问题，但其立足点或目的已然不再是“为了政策”，而系“为了学术”，也就是说，更侧重于从学术视角研究非洲现实问题。虽然“智库研究”必定基于现实议题，但是现实问题研究并非一定就是“智库研究”，这是两个概念。

关于这一点，还可以从下列事例中得到印证。诸如：随着研究所“正规化”建设工作的推进，科研工作逐步由以往的动态性的跟踪研究朝着科研规划的方向过渡；新建立的学术委员会和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在科研规划、学科建设、学术评议和职称评定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学科建设提上日程，研究室设置从以往的“分兵把口”转换为按学科设置；<sup>③</sup>研究成果从内部“运作”转为公开发表，成果形式由以内部报告为主转向以学术论文为主；科研成果越来越注重学术规范，讲求的是“立得住”而不问是否能

<sup>①</sup> 关于1981年6月27日经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办公会议讨论同意的西亚非洲研究所的办所方针和任务的具体表述，详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所史》编写组编：前引书，第14页。

<sup>②</sup> 这4次调整后的办所方针和任务的具体表述，详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所史》编写组编：前引书，第14~16页。

<sup>③</sup> 关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学科调整的具体内容，详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所史》编写组编：前引书：第35~36页。

“用得上”。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职称晋升评定标准的导向作用，科研人员也更加注重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而非“无以为凭”的内部报告。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诚然，中国政府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便开始逐步加大对非工作力度，但是学界对非洲问题的“智库研究”在反应上有一个滞后期。这一方面是由于国内的非洲研究已步入学科发展的轨道，由于学术周期的惯性使然，转轨既需要资金支持也需要观念的转变，因而尚需假以时日；另一方面，官方对学界的需求也不是十分强烈，况且官方需求传导到学术机构的滞后效应很难在短时期内“激活”国内非洲问题的对策研究，这种境况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末，甚至是 21 世纪的第五个年头方逐步得以改观。

## 中国非洲问题“智库研究”重拾升势

2000 年中非合作论坛机制启动后，特别是 2006 年首届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之后，中国非洲问题“智库研究”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进入 21 世纪第二个 10 年，其重拾升势、渐入佳境的发展势头更为凸显。具体表现在：从事政策研究或决策咨询的科研机构、学术社团抑或学者的人数有所增加；作为“智库研究”工作一个重要方面的信息研究和报送工作越益受到学界的重视；报送信息内容在日益丰富、数量不断提升的同时，其质量特别是在准确性、时效性、实用性和思想性方面也有所提升。此外，不少科研机构或学术社团都在制定规划或采取具体的步骤，加大自身的改革或调整力度，以适应“智库研究”的需要。不过，受到体制机制、对智库认知等主客观因素的制约，中国非洲问题“智库研究”的现实境况和发展前景还面临着诸多研究机构自身在短期内难以解决的问题或困难。

### （一）中国非洲问题“智库研究”何以重拾升势

这一时期中国非洲问题“智库研究”的驱动力主要来自三方面，按照其重要程度依次为：其一是中央决策层对智库及“智库研究”工作重要性认识的不断提升，其二是政府职能部门和实际部门对智库产品不断增大的客观需求，其三是相关科研机构或学术社团参与政府决策过程的积极作为。中国非洲问题“智库研究”之重拾升势、渐入佳境，也可以说是三者联动、共同作用的结果。

1. 中央决策层对智库作用重要性的认识大幅提升。

中国非洲问题“智库研究”渐入佳境与中央决策层对智库作用重要性认识的提升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咨政建言”整体氛围向好这一大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改革步入深水区及综合国力提升,特别是在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决策层愈加敏锐地意识到时下决策所面临的内外环境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国际、国内矛盾凸显并且相互交织、复杂多变的情况下,传统的决策模式已不能适应新形势,越来越需要借助智库来为国家的重大决策出谋划策。而在改革开放后的数十年间,许多实际上发挥着智库功能的科研机构也确实为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高速发展及在维护我国战略机遇期的外交斗争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这使得智库在国家决策体系中所占据的地位日益凸显。惟其如是,中央决策层提出要加快“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并将之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将智库视为提升国家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水平的重要载体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关于这一点,可以从以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有关智库的重要论述及相关中央文件中得到印证。继2001年8月7日江泽民总书记在北戴河会见国防科技和社会科学专家时提出“四个同样重要”之后,<sup>①</sup>2002年7月16日他在视察中国社会科学院时再次从战略高度强调了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提出要使之成为“促进党和国家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的重要力量”。<sup>②</sup>2004年1月5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发布《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在这份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首次专门针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制定的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明确提出“要使哲学社会科学界成为党和政府工作的‘思想库’和‘智囊团’。”<sup>③</sup>2012年11月,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再次重申要“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健全决策机制和程序,发挥思想库作用”。<sup>④</sup>党的十八大之后,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更是密集发表或做出关于加强智库建设的重要讲话、

① 详见《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19~321页

② 同上书,第490~496页。

③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4-03/20/content\\_1375785.htm](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4-03/20/content_1375785.htm), 2015-03-04.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2~23页。

批示、论述或决定。继2012年12月15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健全决策咨询机制、按照服务决策、适度超前原则，建设高质量智库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又于2013年4月15日对智库建设做出重要批示，首次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强调“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形势的发展，智库的作用会越来越大，要高度重视、积极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组织形式和管理形式”。同年11月12日，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所做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报告中再次重申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sup>①</sup>继而，在2014年10月27日，习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审议《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时指出，“我们进行治国理政，必须善于集中各方面智慧、凝聚最广泛力量。改革发展任务越是艰巨繁重，越需要强大的智力支持”，并强调要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切实抓好。<sup>②</sup>随后，201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文件强调指出，“智库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日益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意见》还明确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重大意义、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总体目标和基本任务。<sup>③</sup>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从中央领导人的上述论述、指示、批示及相关中央文件中可以看到，中央决策层对智库作用重要性的认识不断加深。现如今，中央决策层业已将智库视为国家软实力及现代国家决策体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并强调智库不仅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载体，其发育水平或成熟度本身也是国家治理水平的一个重要体现。随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也开始真正进入了决策层的战略视野。可以说，中央关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顶层设计的出台标志着我国智库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同时也预示着中国非洲问题“智库研究”勃兴时代的到来。

## 2. 政府职能部门和实际部门对智库研究的需求陡增。

中国非洲问题“智库研究”的兴衰与官方需求的强弱之间始终是一种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28页。

② [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4/1029/c148980-25928251.html](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4/1029/c148980-25928251.html), 2015-02-04.

③ [Http://news.xinhuanet.com/zgix/2015-01/21/c\\_133934292.htm](http://news.xinhuanet.com/zgix/2015-01/21/c_133934292.htm), 2015-02-14.

“正相关”关系。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非洲问题“智库研究”趋于活跃，可谓是中非合作关系迅猛发展的“逻辑延伸”，而官方需求的陡增则在其中发挥着催化剂的作用。进入21世纪后，政府职能部门和实际部门对非洲问题“智库研究”的需求增加，一方面折射出非洲在中国外交战略特别是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提升，另一方面也表明随着中国对非洲需求的增多及在非洲利益趋于多元化，中国在非洲面临的问题也日益增多并日趋复杂。特别是在过去10年，伴随中国在非洲活动的增加，中非合作在国际体系层次、地区层次、国家层次、民间社会层次及合作主体层次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且越来越具挑战性，<sup>①</sup>随之各方尤其是官方对“智库研究”的需求不断增大。这种需求拉动效应反映在“智库研究”主题的取向上，大致可以概括为下述三方面：

其一是旨在协调、解决各种利益关系的“问题导向型”研究需求激增。论坛机制启动后，随着中非合作深度与广度的拓展，中非关系本身也累积了需要解决的许多棘手的实际问题。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之后，随着中国“走进非洲”步伐的提速，中国在非洲活动的国际影响特别是国际反响越来越大，中非合作开始超出中国与非洲双方的范畴，越来越具有多边的性质。而随着国际因素特别是大国因素的介入，中非关系发展的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使得中国在处理中非双边关系的同时，还要协调与其他大国在非洲的利益关系，而后者又与日益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形势，特别是大国间的博弈存在着关联性。

其二是旨在探索、设计新的发展路径的“开拓导向型”研究需求剧增。论坛机制启动后，中非合作步入了“规划发展”的轨道。为了加快中国“走进非洲”的步伐，推进并提升中非在各领域的合作关系和水平，政府各相关职能部门均不同程度地加大了“政策设计”的力度。在此过程中，为了确保政策的可行性和实效性，在政策出台之前、之中和之后，均需要借助来自“智库”的科研机构的智力支持，诸如谋划、论证、献策和评估等。另则，随着企业加快“走进非洲”及服务贸易的发展，国有大型金融机构、公司或企业等实际部门对智库研究的需求也急剧增大。

---

<sup>①</sup> 张宏明：《西方与中国在非洲利益冲突与中国的应对策略》，载《西亚非洲》2010年第7期，第5~11页。



其三是旨在预防、维护中国在非权益的“安全导向型”研究需求陡增。在尚未“走进非洲”之前，除了政治或外交需求之外，中国在非洲几乎没有什么实际利益。例如，截至20世纪末，除了遏制中国台湾“务实外交”或在国际人权斗争中需要非洲国家的支持之外，非洲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似乎均无关中国痛痒。但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在非洲的利益分布越来越广泛，非洲国家的政局走势、安全形势、社会经济状况、对外关系变化或大国对非政策的调整，乃至一些突发事件等，均会直接或间接地对中国在非洲的权益构成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准确地对非洲政治、经济、外交形势做出前瞻性、战略性的研判，对于维护中国在非洲的权益就显得非常必要。

凡此种种，都促生了政府职能部门和实际部门对非洲问题智库研究需求的急剧增加，突出表现在中央和政府职能部门的指令性课题或委托课题急剧增多。这一点亦可从过去10年中国政府职能部门和实际部门与国内非洲研究机构之间的积极互动中窥知一斑。

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为例，<sup>①</sup>过去15年承接的具有“智库研究”性质的工作、任务大致可分为以下几大类：其一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等中央或政府决策部门直接交办的指令性任务；<sup>②</sup>其二是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要报”系统或渠道<sup>③</sup>向“中办”、“国办”等决策层的“信息采集”部门报送的各类“对策信息”；其三是通过课题或项目合作方式，借助其他内部渠道，诸如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新华社、人民日报、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等渠道报送的对策信息；其四是承接相关政府职能部门，诸如外交部、商务部、安全部、文化部、农业部、国家发展

---

<sup>①</sup> 鉴于“智库研究”成果特别是那些涉及政策研究或决策咨询类的成果一般均以内部报告的形式提交，有些还涉密，难以对国内非洲问题“智库研究”成果做出全面或系统的统计；在文中仅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科研人员承接的课题或项目为例。

<sup>②</sup> 这类临时交办任务以专题咨询报告居多，也有一些是为国家领导人出访非洲提供的“参阅材料”。此外，近年来，中央或政府相关部门还主动就一些比较紧急或专门的问题通过相关内部“信息采集”渠道直接向学者约稿。

<sup>③</sup>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要报”是一个系列，由要报正刊、研究报告、专供信息、思想理论动态、国情调研、领导参阅等诸多内部刊物构成，经信息情报研究院编辑后报送“中办”、“国办”，可直达中央或政府决策部门的主要领导人。

改革委员会、国家海洋局等相关职能司局的委托课题；<sup>①</sup> 其五是相关实际部门，其中尤以国有大型金融机构、国有企业的委托课题居多；<sup>②</sup> 其六是与国外政府机构、基金会、智库等联合研究或合作项目，等等。

此外，关于政府职能部门和实际部门与国内非洲研究机构之间的积极互动，还可以从科研人员频繁应邀参与中央和政府相关部门，诸如外交部非洲司和政策法规司、商务部西亚非洲司和援外司、国资委外资司、发改委有关司局、文化部外联局、中联部四局等举办的各种咨询会议，以及实际部门的内部咨询会、调研会、研讨会中得到印证。

### 3. 科研机构或学术社团科研工作重心的转移和积极作为。

国内非洲学界或学人的主观努力主要反映在其大局意识、服务意识获得提升。例如，研究机构的学者积极响应中央加强智库建设的号召，积极参与政府职能部门或实际部门的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并将之视为发挥思想库、智囊团作用的具体体现。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研究机构与中央关于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要求及与政府职能部门或实际部门需求之间的“两个互动”中窥知一斑，亦可从科研机构的功能定位和工作重心的“两个转型”中得到印证。

其一，功能定位逐步由学术机构向“学术型智库”转型。近年来，国内一些从事非洲问题研究的新老科研机构或学术社团都不同程度通过调整自身的角色或功能定位，以适应中央关于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新要求。这突出反映在：国内不少科研机构的方针、任务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明确提出了“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发展方向。不仅原有的科研机构，诸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非洲研究所、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亚洲与非洲研究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西亚非洲研究中心、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

---

<sup>①</sup> “委托课题”分为直接指定承受方或通过竞标遴选承受方两种方式。这类课题多是“命题”作文，以内部研究报告或咨询报告为主要形式，承受方需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后提交；其规模大小不等，既有数千字的小型研究报告，也有万字以上甚至10万字的中大型研究报告。进入21世纪后，此类课题不断增加。

<sup>②</sup> 诸如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中非发展基金等，以及中国石油集团公司、中国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中国铁道第一勘察设计院等。这类委托课题以大、中型研究报告居多，少则3万~5万字，多则10万字，还有50万字甚至150字的超大型报告。后者一般要用半年或一年时间倾全所之力完成。

所“非洲研究部”<sup>①</sup>等在这方面有所动作，而且国内一些高等院校的非洲研究机构，如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也提出“建设国家级新型高校智库的目标”。

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为例，根据中央“五·一九”会议精神<sup>②</sup>、中央对中国社会科学院提出的“三个定位”要求<sup>③</sup>，以及李长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关于贯彻落实中央“五·一九”会议精神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的汇报》上的批示精神<sup>④</sup>，2011年的9月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正式启动。在院统一规划、部署下，西亚非洲研究所实施“创新工程”为抓手，通过“创新学科”的路径逐步加大向“学术型智库”转型的力度。经过近一年的酝酿、筹划、论证和研讨，西亚非洲研究所于2011年12月向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报了以建设“学术型智库”<sup>⑤</sup>为目标的“创新方案”（下称“报送方案”）。该方案的创新之处就在于“创设”了一个全新的学科——“中国与非洲关系”学科，并在其下设置了“中国对非投资战略研究”、“中国对非关系的国际战略研究”、“中国在非洲的‘软实力’研究”和“中国与西亚非洲国家关系的国际舆情研究”4个“创新项目”，用以支撑该“创新学科”。上述“创新项目”的研究要义与以往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的“涉我性”，将非洲问题研究更加紧密地贴近“中国需求”，直接服务于我国的外交和发展战略，从而回答了“为什么做研究”和“为谁而研究”的问题。

---

①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于2012年6月成立“非洲研究部”，着眼于中非关系和非洲发展领域的战略性、前瞻性问题的研究。

② 2005年5月19日，胡锦涛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专题听取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汇报，审议批准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的报告。胡锦涛总书记在听取汇报后发表了《关于进一步办好中国社会科学院社科院》重要讲话。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史研究室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编年简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536页。

③ 2007年5月25日，李长春在致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30周年的贺信中，代表党中央向中国社科院提出了“三个定位”的要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要努力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党中央国务院重要的思想库和智囊团，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最高殿堂。[http://www.gov.cn/ldhd/2007-05/25/content\\_626246.htm](http://www.gov.cn/ldhd/2007-05/25/content_626246.htm), 2015-02-05.

④ 2011年2月1日，李长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关于贯彻落实中央“5.19”会议精神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的汇报》上批示：“政治局常委会讨论确定的要求和各项工作，是对社科院最重要的指导原则，要全力组织落实好。”

⑤ 所谓“学术型智库”，就是在基础研究的基础上从事非洲问题的应用对策研究，这一定位到目前来看还是比较准确的，它既不同于政府相关部委内设的政策研究室，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纯学术研究，目的在于扬长避短，充分发挥我所的学科优势和科研特长。

“报送方案”为“中国与非洲关系”学科设定的总目标是：“紧密围绕中国与非洲关系实践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基础研究与对策研究并重，以现实应用研究为主攻方向，凸显智库功能；通过战略性和前瞻性研究成果，充分发挥思想库、智囊团作用”；力争用5年时间“全面建设中国与非洲关系这一理论基础坚实、智库功能强大的新兴优势学科。”<sup>①</sup>为了落实这一“总目标”，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的总体要求，西亚非洲研究所还在科研组织、资源配置等方面做出重大改革或调整。其“创新之处”是打破了过去以研究室为核心开展科研活动的模式，转而设立了更加灵活、务实且更适宜从事“智库研究”的项目组，即通过竞聘上岗、双向选择方式，与“中国与非洲关系”这一“创新学科”项下的4个“创新项目”相对应设置了4个创新项目组。科研经费的配置也从过去的以研究室为主向项目组倾斜，并且在项目组实行首席研究员负责制。此举通过双向选择方式将最适合“相关项目研究”的学者组合到一起，从而实现了科研资源优化配置。3年多的实践证明，这种科研组织形式更适宜于“智库研究”，也更有利于智库产品的持续产出（关于这一点下文还将展开）。

其二，工作重心逐步从学术研究向“智库研究”转型。在科研机构的工作方针逐步由从纯学术机构向“学术型智库”转型的同时，国内涉猎非洲问题研究的科研机构或学术社团在科研工作重心方面也发生了两个比较显著的变化：一是越来越多的研究机构从以往的基础研究转向应用研究，其中包括一些专司非洲历史研究的高校学术机构；二是越来越多的科研机构或学术社团关注“涉我的”对策研究，这在那些原本从事非洲现实问题应用对策研究的科研机构尤为凸显。目前“经常性”涉猎这方面研究的科研机构<sup>②</sup>主要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非洲研究所、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亚洲与非洲研究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西亚非洲研究中心等。

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为例，随着科研方向的调整，工作重

---

<sup>①</sup>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编制：《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创新单位总方案》，2011年12月。需要指出的，该“报送方案”涵盖中国与中东关系研究和中国与非洲关系研究两个学科，基于“论题”和行文考虑，笔者只截取了其中的“非洲部分”。下同。

<sup>②</sup> 所谓“经常性”涉猎非洲问题应用对策研究的科研机构，系指那些以应用对策研究为主业，能够持续生产智库产品，有自己的报送渠道，所报送的“对策信息”能够直达中央决策层并得到中央领导人批复概率较高的科研机构。

心也逐步从学术研究向“智库研究”转型。近年来，科研工作的重心越来越聚焦影响中非关系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以及关乎我国对非政策的全局性、综合性、趋势性、前瞻性问题。以笔者担任首席研究员的“中国对非关系的国际战略研究”项目为例，该项目不同于以往的非洲国际关系问题研究，它是专门研究中非关系发展在国际体系层次面临的各种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其中又以分析大国与中国在非洲的利益关系或利益冲突及研判影响中非关系走势的各种“环境因素”及其他变量条件为重点，旨在最大限度地降低或化解中国“走进非洲”的国际阻力。

为了实现“报送方案”所提出的建立“学术型智库”的目标，研究所还就科研工作重心的转移做出相应的规划和部署：诸如“加强研究选题的针对性，从世界眼光和大局观念出发，使选题更加贴近国家发展、安全需要及学科发展的需要；提高研究成果的可靠性，重视实地调研和获取第一手资料，广泛深入地开展交流合作；强调成果的原创性，鼓励发现新材料、创新概念和观点，发现或运用新方法，勇于构建新理论；注意科研成果的社会效果，及时收集反馈信息，加强成果的评估和考核，不断改进研究工作等。”<sup>①</sup>此外，研究所还在“报送方案”中单列了“发挥思想库智囊团功能目标及实施方案”，诸如“加强信息报送的组织领导，成立信息报送领导小组，使其承担起全所信息报送的日常管理工作；密切跟踪地区局势风云变化，高度关注国家利益和安全，保持与中央和政府相关部门联系，敏感捕捉重大信息和研究选题；努力提高战略思维能力、局势分析和信息分析预测能力，以及报送信息和调研报告的写作水平，提高报送信息的质量；充分利用院级信息报送渠道，探索所级信息报送的有效途径；积极承担中央和政府部门以及大型国有企业的委托调研任务等。”<sup>②</sup>

值得欣慰的是，研究所经过3年多的努力基本上实现了“报送方案”预设的目标（关于这方面的内容下文还将论及）。

## （二）中国非洲问题“智库研究”的成效与问题

近年来，在多重利好因素的促动下，国内非洲学界的智库建设特别是“智库研究”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相关科研机构也把握机遇、积极作为，

---

<sup>①</sup> 上述引文，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编制：《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创新单位总方案》，2011年12月。

<sup>②</sup> 同上文。

在转变科研方针,实现科研工作重心转移方面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效。不过,按照中央关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要求,总体而言,国内多数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在智库建设和“智库研究”方面仍处于转型、适应或探索阶段,其前行之路亦非坦途。

#### 1. 非洲问题“智库研究”取得的初步成效

近年来,国内相关科研机构在智库建设和“智库研究”方面已经收到了初步的成效。其突出表现在,一些科研机构的功能定位正朝着有利于发挥智库作用的方向转型;科研人员的大局意识、问题意识、服务意识不断增强;科研组织形态或方式更加适应“智库研究”的需求;学术活动更加务实,注重自主性和实用性;对策研究的选题更加贴近中非关系发展的现实特别是中国的需求,报送信息的内容更加丰富、数量和质量同步提升,智库产品的传播方式或转化渠道趋于多样化,等等。<sup>①</sup>

其一,新的科研组织形态或方式更加适应于“智库研究”。智库与学术研究机构除了功能上的差异之外,在科研活动的组织结构上也有其自身特点。现代“智库研究”系多学科综合研究,它多是在课题或项目形式下、以课题组或项目组为载体展开工作的,而不像学术研究那样,按学科选题、学科设置的研究室为载体展开工作。为了在发挥思想库、智囊团作用的同时又不失其原有的基础研究和学科优势,西亚非洲研究所借创新工程启动之机,积极调整科研组织形态,在以往按学科设置的研究室的基础上又增添了如前所述的项目组。

项目组既是一个科研平台,同时也是一个快速反应机制。其优势在于,它打破或打通了以往学科结构的壁垒及基层科研单位的“条块分割”状态,改变了以往研究力量分散、大多数人单兵作战的科研工作方式,可以根据研究任务(项目或课题)的需要,实现学术资源特别是科研力量在所内外、院内外,甚至国内外的优化配置。尽管受到体制、机制的制约,目前西亚非洲所对学术资源的优化配置尚停留在所内的跨室调配阶段,但这一发展方向无疑是正确的。

评判和检验一个科研组织方式的好坏,关键看它是否有利于科研活动的

---

<sup>①</sup> 基于“导言”之“其三”所陈述的原因,同时也是为了使文章“言之有物”,下文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近年来的一些做法及其收效为例。

充分且有效的开展，特别是是否有利于快出成果、出好成果。从近几年西亚非洲研究所的实践结果来看，以项目组为主体或平台的科研组织方式，更便于“智库研究”工作的组织、实施和管理，更便于集中优势力量进行重大项目的科研攻关，更便于有针对性、灵活多样地开展各项科研活动，更有利于发挥、调动科研人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因而也更适应于“智库研究”工作的需要。随着学科布局的优化及物质条件的改善，近年来，西亚非洲所各类学术活动，尤其是“智库研究”数量不仅大大超过以往，而且质量也有了明显提升。

这具体体现在，为了获取第一手资料，使应用对策研究言之有物，提出的“解决方案”有的放矢并具有可操作性。西亚非洲所科研人员依托“创新项目组”，采取“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的方式，借助各种渠道、通过各种形式加强或提升国情调研、赴研究对象国实地调研和加大国际学术交流的力度和频率，初步扭转了以往“闭门造车”书斋式的研究方式。与此同时，各类学术活动也更加注重实效或目的性，即根据科研工作的需要或围绕科研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开展各类学术活动，不搞花架子，不做无用功。例如，基于应用对策研究“用得上”之考虑，我所科研人员以“创新项目组”为单位，带着问题或紧密配合在研课题的实际需求，举办自主性专题学术会议或赴研究对象国调研；主动并有意识地加强了与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的联系，以便在交流中获取有用信息，从国家发展需要和政府关心的问题中挖掘选题，从而提高了科研人员在选题方面的敏锐度和准确度，并确保了研究成果的及时性、可靠性和原创性。<sup>①</sup>

其二，信息研究和信息报送的数量和质量双双提升。在我国现阶段，信息研究和报送工作既是“智库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及“智库研究”成果的重要表现形式，同时也是西亚非洲所科研工作重心从学术研究向“智库研究”转型的具体体现。进入新世纪特别是 21 世纪第二个 10 年，西亚非洲所科研人员紧密结合中央决策需求，按照“新”、“准”、“短”、“快”的信息报送要求，以“创新项目组”为单位，依托基础研究或系统研究，充分发挥多语种、多学科研究优势，以回答中国与非洲关系实践中遇到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

<sup>①</sup>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项目组这种科研组织形式更加有利于“智库研究”，但能否用好这一“平台”并使之效益最大化则更多的是取决于项目组首席研究员的责任心。事实上，西亚非洲所各个项目组的情况也不尽相同。

为取向,利用各种信息报送渠道,特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sup>①</sup>这一院级信息报送主渠道,加大信息研究和报送力度,以原创性的研究成果为党和国家决策提供咨询服务和对策建议。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sup>②</sup>的反馈,其中有关非洲或中非关系的对策信息报送数量,从2011年和2012年的20篇左右,增至2013年的26篇、2014年的30篇。

这些内部报告既有涉及中非关系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现实或理论问题的趋势分析或对策研究报告,也有围绕当前热点、难点问题或突发事件就事论事或一事一报的“情况报告”。这类内部报告短小精悍,多则二三千字,少则千字,笔墨不多却能勾勒出问题的轮廓并提出相应对策,并按其内容、功能、报送对象等被归入“要报”的不同系列。相对于大中型研究报告,这类对策研究报告反应及时,上传快捷,颇受领导人的重视,批复率也较高。

近年来,西亚非洲所信息研究和报送在数量增加的同时质量也有所提高,这一点可以从上述报送信息的获奖率中得到印证。根据笔者掌握的情况,<sup>③</sup>2011年,西亚非洲所有一篇报送信息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对策信息对策研究类”特等奖,4篇获得三等奖;另有一篇报送信息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对策信息情况报告类”一等奖,7篇获得三等奖。2013年,4篇报送信息获得“对策信息对策研究类奖”三等奖,10篇获得“对策信息情况报告类奖”三等奖。<sup>④</sup>此外,西亚非洲所还先后在2011年和2013年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对策信息组织奖”。<sup>⑤</sup>

---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信息报送渠道,即“要报”系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即要报正刊、《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研究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专供信息》、《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思想理论动态》、《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国情调研》、《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领导参阅》等内部刊物构成。上述内部刊物由2011年9月1日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主办。除此之外,还有《社科网讯》、《国外社会科学》、《思想与战略文摘》、《境外智库研究》等期刊平台。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于2011年9月1日成立,其主要职责是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收集、编辑和报送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学者开展综合研究、跟踪分析、预测研判、对策咨询所形成的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的科研成果,以及国际国内重要思想理论观点,重要战略要情及动向,重要事件、活动和热点问题的信息动态,为党和国家决策提供及时有效的智力支持和咨询服务。研究院内设5个部门,即国内编研部、国际编研部、综合研究部、期刊编辑部、综合事务部。

③ 2012年的统计数据缺失,2014年尚未评奖。

④ 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评奖标准,这意味着上述“报送信息”得到了相关中央领导的批示。

⑤ 该奖项亦称“集体奖”,旨在奖励信息研究和报送工作做得比较好的单位,每年约有8个单位获奖。



在借助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报送渠道的同时，西亚非洲所还在2012年创办了《西亚非洲问题专报》，<sup>①</sup>目的是通过这一渠道主动、及时地将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直接报送给相关政府职能部门或实际部门。2012年至2014年，涉及非洲或中非关系的“专报”依次为11篇、18篇和16篇。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协调、整合信息研究和报送资源，进一步提高报送信息质量和效率，促进科研成果转化。研究所还于2014年10月成立了“信息室”，其主要职责是协调全所信息研究工作的选题、采集、编辑、报送和反馈工作。

其三，科研成果的发布平台、传播方式和渠道趋于多样化。除了通过内部报送渠道向中央决策层及相关政府职能部门报送对策信息之外，西亚非洲所还拓展或新辟了面向社会的成果发布平台或渠道。在成果传播方式上，根据应用对策研究成果的不同特点，着力推动成果传播载体、渠道和方式的多样化。具体做法如下：

其一，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统一部署，对公开出版物《西亚非洲》双月刊的选题进行调整，以使之更加贴近现实问题，及时反映当前非洲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等方面的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目前，其刊载的涉及现实问题研究的文章占80%以上。其二，自2012年起，研究所将年度研究报告集《中东非洲发展报告》“一分为二”，独立成卷的《非洲发展报告》不仅容量增加一倍，而且其选题也更加注重问题导向，尤其是关注影响中非关系可持续发展的各种“环境因素”或其他变量因素，以及“涉我的”非洲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研究。其三，在所网站上开设“非洲论坛”，专门刊载反映非洲或与非洲相关的重大突发性事件、地区热点等的短小精悍、观点鲜明、时效性强的原创性文章。此外，研究所还鼓励科研人员通过国内外文期刊，特别是国外知名刊物或其他媒介传播中国学者的观点；通过举行新书新闻发布会、借助网络或其他媒介传播科研成果，等等。

应当说，上述做法在促使西亚非洲所科研人员的研究从基础理论研究向应用对策研究的转型方面还是起到了一定的引领或导向作用。以年度研究报告集《非洲发展报告》为例，除了“固定栏目”的选题继续关注非洲、中非关系及与之相关的“时事”外，每一年“专题报告”选题的择定也更加注重

---

<sup>①</sup>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西亚非洲问题专报》所能送达的层级较低，即便有“领导批示”或反馈意见，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现行评奖办法，也不可能获得最低一级的奖项；加之，按照现行量化考核指标，在该《专报》刊载的文章不能计入以分数反映的工作量，因此该《专报》已于2014年底停办。

向“智库研究”导引。作为皮书主编，笔者在择定“专题报告”的选题时主要是基于下述考虑：首先，“专题报告”的选题应能够反映中非关系发展在某一领域或方面的最新发展态势，或是中非关系发展的前沿问题。其次，处理好“专题报告”的选题与西亚非洲所现有的4个创新项目组在研课题的阶段成果之间的关系，使之在“供需关系”上形成良性互动。再次，处理好每一年度“专题报告”选题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使之在整体上成为一个相互呼应、关联的系列。当然要达到这一目标，研究所首先必须把科研成果做得像智库产品，这就需要从“源头”抓起。

关于这一点，可以从笔者为2014年《非洲发展报告》专题报告“世界主要国家对非政策新动向”所拟定的写作“导引”中窥知一斑。下文是笔者发给每一位参与专题报告“世界主要国家对非政策新动向”撰稿人的“总体撰写构想”：即“侧重于从研究对象国（美国、法国、英国、日本、德国、俄罗斯、印度、土耳其，下同）对非政策的视角切入，围绕其政策动向、重点、意图及其成效、对中非关系影响及中国的对策等展开”。与此同时，“导引”还提示作者在撰稿过程中所应注意的相关事项：诸如：（1）研究对象国在2006年北京峰会之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以来，在加强对非工作方面的战略考量和政策动向；非洲在其外交战略中的地位是否发生了变化，或在其中扮演何种角色。（2）研究对象国对非关系新动向的政策目标及其实施效应；其新动向或变化是否受到“中国因素”的刺激或影响；其政策变化是否会在主观或客观上对中国在非利益或中非关系的发展造成影响，中国应如何应对。（3）研究对象国的非洲政策或其在发展对非关系方面有哪些传统、特点、优势或有益的经验值得中国借鉴等。从结果来看，《非洲发展报告》基本达到了预期的目标，且业已成为非洲问题“智库研究”成果的一个公开的推介或展示平台。

## 2. 国内非洲问题“智库研究”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毋庸讳言，目前国内非洲问题“智库研究”远远滞后于快速发展的中非关系的实践，更难以满足各方需求。究其因，既有体制、机制等“大环境”方面的原因，也有研究机构或学者认识上的偏差或能力上的问题。因此，坦率地讲，国内非洲学界的智库建设和“智库研究”的现实境况和发展前景还面临着诸多科研机构自身在短期内难以解决的问题或困难。即便是那些研究机构自身的问题，由于“积重难返”之故，要想真正解决问题亦非易事。在

下列问题中，有些是中国智库建设和“智库研究”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有些则系国内非洲学界的“特有”问题。<sup>①</sup>

其一，研究机构的角色或功能定位游移不定。近年来，在中央倡导“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热潮的推动下，学界也纷纷闻风而动，甚或趋之若鹜。这使得国内从事非洲问题研究的科研机构或学术社团在角色或功能定位上面临新的抉择：专注于学术研究，还是从事“智库研究”，或是两者“兼而做之”。从笔者掌握的情况看，虽然许多科研机构或学术社团纷纷表示要从事“智库研究”，但至少截至目前，它们之中的多数尚缺乏明确和准确的角色或功能定位。在究竟“做不做”，以及“做什么”、“怎么做”的问题上，仍然滞留在“表述”层面，并未真正付诸实践。

之所以将这个问题置于首要位置，主要是基于目前国内非洲问题研究机构“小”、“散”、“弱”、“虚”的现实或特点。虽然从理论上说，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换言之，学术研究与“智库研究”并不矛盾，甚至还存在互补性，但“正确认识”与“具体实践”毕竟是两回事，在操作层面要想真正处理好两者的关系绝非易事。这是因为，国内非洲问题研究机构的现实是，除极少数科研机构之外，多数系“非实体性”学术社团，不仅人手有限，且多兼职从事非洲研究。在这种情况下，“兼顾”难免顾此失彼，弄得不好，甚至会两头都落空，所谓“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也。当然，个别有条件的机构可以“两者兼顾”，即一部分人从事学术研究，一部分人从事智库研究。简言之，国内从事非洲研究的科研机构或学术社团在是否向智库转型的问题上，宜早做决断，当断不断，则要反受其“乱”，但何去何从一定要结合本单位的实际。

其二，“智库研究”的经营思路不明确或不准确。在确定了从事“智库研究”之后，接下来的问题是从哪个方面、领域或问题入手，或是专注于哪个方面、领域或问题的研究。坦率地讲，在“做什么”的问题上，多数科研机构或学术社团存在较大的随意性：一些机构是“有什么就做什么”，“能捞到什么就做什么”；还有一些机构则是“什么热做什么”，“什么时髦做什么”，甚至不惜“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然而，就目前国内非洲学界而言，还没有任

---

<sup>①</sup> 限于篇幅，本文只罗列问题，关于“中国非洲问题‘智库研究’的出路”，参见《非洲发展报告（2014-1045）》，预计于2015年8月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

何一个机构能够“通吃”非洲问题“智库研究”的“全产业链”。实践经验亦证明，在相同的条件下和时间内，那些“专吃”的机构（即专注于自身最擅长的核心业务的机构）往往能够获得比“通吃”的机构更快、更好的收益。常言道：舍得，舍得；有舍，方有得；舍不得，就得不到；什么都想做，很可能到头来什么都做不好。

如果将智库比作“知识工厂”或“思想企业”，将智库成果视为一种产品，那么，从事“智库研究”就如同经营企业一样，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首先要寻觅自己的“立足之地”，解决好“做什么”的问题。而“专业化”经营不失为“智库研究”的一种经营战略。专业化亦称专门化，它与多元化相对应。在非洲问题“智库研究”中，所谓专业化经营，顾名思义系指某一科研机构或学术社团的研究方向、研究领域非常明确，能够集中人力、财力对非洲问题的某一方面、领域甚或问题，进行长期的、系统的跟踪研究，或是专注于经营其所擅长的核心业务，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资源配置的效率，进而形成了自身的研究特色和优势。通俗些说，“智库研究”的专业化经营实际上就是“特色经营”。鉴于国内非洲问题研究机构“小”、“散”、“弱”、“虚”的现实，较之“四面出击”、“八面开花”，其试图通过扩大研究范围来获得本机构的影响力、聚焦主业、通过自己的拳头产品来确立自身的竞争优势和市场优势的做法，则更可取。<sup>①</sup>

其三，“智库研究”的职业化、实体化程度偏低。在当今世界，“谋”“断”分离的政治治理和决策方式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现代“智库研究”业已成为一种职业，已呈现出产业化趋势，而这种职业化和产业化趋势又多是以作为“智库研究”主体的实体性科研机构为依托的。国际成熟智库的成功经验表明，智库一般都是一个由科研、行政、后勤等人员有机组成的稳定团队，后者是保障智库高效运作、满足“智库研究”产业化趋势，以及智库产品持续出产、顺畅转化不可或缺的条件。

而目前国内从事非洲问题研究机构的现实是，实体性科研机构居少，非实体性学术社团居多，这在高校尤为普遍。其问题在于，科研工作并非教师的唯一工作或主业，许多人是在教学之余从事非洲问题研究。另则，受到体

---

<sup>①</sup> 一些在国际上享有知名度的智库也在这方面提供了成功的范例。例如：兰德公司是以潜心研究军事技术和军事战略起家的；移民政策研究所专司与移民有关的政策研究；皮尤研究中心则专注于做民意调查等。

制机制因素的影响，这些非实体性机构在人才引进、资金筹措等方面享受不到足够的政策支持。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不少学术社团的组织结构缺乏稳定性，甚至连是否能够稳定队伍都是一个问题。之所以说职业化和实体化是现阶段国内非洲问题智库建设和“智库研究”所面临的一大难题，一方面，从趋势上看，我国非洲问题研究的新生力量将主要来自高校；另一方面，这个问题不是学界自身能够解决的，或将长期制约国内非洲问题“智库研究”的发展。<sup>①</sup>

即便是一些实体性科研机构也同样面临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其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规模普遍偏小。非洲研究在多数实体性科研机构处于边缘化境地，少则一两人，多则也不过四五人。而受到非洲在我国外交和发展战略中排序及人员编制等因素的影响，这种状况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得到改变。此外，在职业化问题上，除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非洲研究所之外，多数机构并未将“智库研究”作为其主业，而只是其全部工作的一部分，与真正意义上“智库研究”的职业化相距甚远。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为例，至少有半数以上的学者并未将“智库研究”作为其主业，更不要说将之作为自己的职业了。

其四，能够适应、胜任“智库研究”的复合型人才短缺。人才是智库建设的核心，也是“智库研究”的主体。然而，偌大一个中国，专职从事非洲问题研究的学者不过百余人。而有意愿并能够适应、胜任“智库研究”的人，即“智库学者”则更是少之又少。近年来，从相关“信息采集部门”、政府职能部门或实际部门的反馈中获悉：国内各类非洲问题“智库研究”成果，绝大多数“不对路”，因而也就“用不上”。其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是：一些“智库研究”的选题针对性不强甚或是“伪命题”，对我国对非关系的工作前沿缺乏必要的了解，甚至将一些已经解决的问题抑或已经“不是问题的问题”拿来研究；一些“智库产品”沉溺于文字游戏或“学术规范”，对一些无足轻重的问题旁征博引、浓墨重彩，而在“涉我”等实质性问题，要么惜字如金、浅尝辄止，要么是不接地气、难以满足决策需求；一些学者将“智库研究”当作学术研究来做，将研究报告当作学术论文来写，甚至连“智

---

<sup>①</sup> 从笔者掌握的情况来看，一些高校的非实体性学术社团都试图通过转变为实体性科研机构招兵买马扩充研究力量，但受到体制机制特别是人员编制的限制，短期内很难如愿。

库产品”的种类或“规格”都分不清；还有一些智库产品的行文，或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或是隔靴搔痒，答非所问。总之，众多“智库研究”产品都是在做“无用功”。上述问题虽然表现在“智库研究”或智库产品中，但是透过这些现象，反映出的则是从事“智库研究”或生产“智库产品”的人的能力问题。

毋庸讳言，缺乏胜任“智库研究”的人才，或“智库研究”从业人员能力不足，是目前科研机构或学术社团普遍面临的问题。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为例，目前能够适应“智库研究”的科研人员不足1/2。其原因在于，“智库研究”所需要的是一种复合型人才。一个合格的智库学者，除了要具备学术研究的操守和功力之外，还需要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问题意识、责任意识、忧患意识和战略思维。具体到非洲问题“智库研究”，一个称职的智库学者不仅要熟悉非洲国家的情况，还有具备宽广的国际视野并了解国内各方需求。而要做到这一点，智库学者自身的努力、修为、悟性只是一个方面，其实践经验特别是在职能部门实际工作经历也是不可或缺的。另则，智库学者同样是“有非洲的经历”，但其读书和工作两回事，学到、领悟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sup>①</sup>国际知名智库之所以大多集中于美国，其“旋转门”机制功不可没。因为所谓“智库研究”，实际上就是一个“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过程。诚然，有些“东西”确实可通过体制、机制的改革及人为的努力而获取或习得，但这并非朝夕之事，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其五，缺乏“智库研究”所必需的信息共享和参与机制。“智库研究”旨在出谋划策，但智库学者所谋划的不是一般的小点子、小主意，而系事关国家发展与安危之大谋略、大计策。“智库研究”的竞争力在于其高质量的智库产品所具有的预见性、前瞻性和储备性，后者是建立在对研究对象的有效的预测或准确的研判基础上的。要达到这一目标，需要智库学者有一些必备的前提条件：诸如，能够时常接触到决策层或通过人脉关系获悉决策层的所

---

<sup>①</sup> 笔者个人的经历亦可印证这一点。在塞内加尔达喀尔大学经济法学院及“黑非洲基础研究所”进修时，笔者收获的主要是与非洲研究相关的专业知识、学术资料、研究方法；而在中国驻几内亚和贝宁使馆调研室的工作经历，则“耳濡目染”地提升了笔者的问题意识。另则，这种工作经历也更容易建立或维系与政府职能部门的联系或人脉关系，而这些都是从事“智库研究”所不可或缺的。

思所想；能够阅览涉密文件或通过相关内部渠道获悉文件的精神；具有相关的实际工作经验或丰富的阅历；掌握相关政府职能部门或实际部门的工作前沿与需求；能够及时获取与研究对象相关的内部信息资源；了解研究对象的前沿学术动态，等等。

中央反复强调并要求从事“智库研究”的科研机构 and 学者急国家之所需，要牢固树立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意识；不仅要思决策者之所想，而且还要思其所未想，紧密围绕国家重大需求，及时提供具有针对性、前瞻性甚或储备性的战略思路或政策建议。然而，在现实中，这仅仅只是一种期望而已。因为现阶段在我国缺乏“信息资源”共享和参与机制、缺乏跨领域、跨部门“旋转门”人员交流制度的情况下，加之受制于“保密”纪律，即便是体制内的官方智库也难能同时具备上述条件，更不要说一般科研机构或学术社团了。试想：如果不了解决策层的所思所想，又何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呢？当然，并不是说不同时具备上述条件就不能从事非洲问题的“智库研究”，但它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束缚智库学者的思维，影响“智库研究”选题的针对性与前瞻性，进而使智库产品的质量大打折扣。而上述问题的多数属于体制机制的“制度范畴”，非科研机构或学术社团所能解决的，因而将长期制约包括非洲问题在内的“智库研究”的发展。

其六，“智库研究”的需求信息及项目供给机制不健全。咨政建言是智库诸多功能中的主要功能，也是“智库研究”的主要目标，但要充分发挥和实现这一功能或目标却并不仅仅取决于研究机构的“一厢情愿”，而需要智库产品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双方共同的付出和努力。在现阶段，有一类被称之为“委托课题”的“智库研究”，其主动权掌握在作为智库产品消费者的政府职能部门或实际部门手中，换言之，这类“智库研究”成果是买方市场。鉴于我国现阶段政府采购智库产品体系或机制尚不健全的现实，其“前期订制”过程就显得尤为重要。既然是“需求决定供给”的买方市场，那么，消费者的需求、眼光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了作为供货商的研究机构生产什么样的产品及其品质。应当说，在这方面并不存在什么操作难度，但实际情况却差强人意。

目前，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在“项目供给”方面，即研究课题设置方面没有按照“智库研究”或智库产品的标准或要求严格从源头上把关，除少数“指令性课题”之外，多数研究

课题则由申报者根据个人的喜好选题；其次，在委托课题立项方面，缺乏招投标程序和公平竞争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平衡”关系、“撒胡椒面”的现象；再次，在成果验收方面，缺乏“第三方”参与的评估机制，对不合格产品缺乏相应惩戒措施，等等。按照常理，作为政府职能部门所设立的研究项目，理当是官方需求之物，理当属于“智库研究”范畴，然而从最终成果来看，真正属于“智库研究”、称得上“智库产品”的东西并不多，能“用得上”的东西就更少了。笔者不能揣测相关政府职能部门是否真正了解智库的功能，也不敢妄言其是否清楚作为智库产品消费者自身的需求，但透过上述现象，至少在“表象”上反映出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尚未完全找准自身的定位。

其七，智库产品的传输渠道不畅、转化途径单一。在智库产品的成果转化或价值实现方面，中国与外国的最大差别是，国外的智库产品一般都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平台或媒介公开推介、展示、发表或出版。而在我国，智库产品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以内部报告的形式直接上报党和政府的核心决策层或相关领导人的方式来实现其成果转化和价值的。这亦可谓是“智库研究”或智库产品的“中国特色”。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类智库产品多与政策研究或决策咨询相关，其政策性和时效性都非常强，而且一般都涉密，因此为确保“信息安全”，需要有便捷、畅通的内部专门传输渠道送达决策层的“信息采集部门”。这类“内外有别”的智库产品如果不能及时上达决策层，对智库学者而言，就等于做了“无用功”。

但在我国现阶段，智库产品的传播和转化途径均比较单一，有些“内部报告”更是存在报送渠道狭窄、拥挤甚或不畅等问题。加之，中办和国办等决策层的“信息采集部门”一般不接收体制外渠道输送来的“信息”，致使诸多有志于生产此类智库产品的机构或学者处于“报国无门”的境地。就笔者掌握的情况来看，除了上文提及的少数几个“经常性”从事非洲问题应用对策研究的科研机构拥有自己固定、通畅的报送渠道外，绝大多数研究机构特别是高校的学术社团多是借助教育部的“内部渠道”报送信息。由于受到保密制度的规约，这类智库产品一般要通过体制内的专门渠道传输，不宜通过互联网上传输。在这种情况下，即便生产出这类智库产品，也难以及时、有效地被送达决策层，其决策影响力更无从谈起。虽然目前国内相关部门已经着手解决疏通智库产品的传输渠道和转化途径问题，但真正解决尚需假以时日。



其八，现行评价体系不适用也不利于“智库研究”。研究成果的评价机制或评价体系对研究机构和学者个人研究工作的取向或重心具有导向作用。这里主要涉及职称评价体系和智库产品评价体系两个方面的问题。就前者而言，为响应中央关于加快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号召，国内不少科研机构或学术社团在探索向智库转型的过程中已经或多或少地开始从事“智库研究”，但是“制度层面”的配套措施却尚未与之同步。这突出表现在，按照现行职称评价体系，学者晋升职称依然要凭借学术论文和学术专著，而非研究报告，特别是无以为凭的内部报告。这实际上依然是鼓励“学术研究”，而非“智库研究”。虽然一些研究机构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并着手完善配套措施，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从2015年开始将获奖的内部报告列入职称评定的成果依据，但是如果欲晋升正高级职称，没有一两部学术专著，还是“说不过去”。

就后者而言，目前国内虽然尚无对智库产品统一的评价体系，不过，多数从事应用对策研究的科研机构对内部报告采取以“报送信息”或研究报告获得哪个层级的领导批示作为衡量指标或评判依据。站在成果转化或价值实现的角度，应当说以此作为“衡量指标”或评判依据有其合理性。但问题是，从结果来看，容易获得批复的往往是那些一事一报、就事论事或以“出点子”为主的应急性“对策信息”居多，而那些耗时费力的涉及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储备性的研究报告反而不易获批，因为这些都是事关国家发展与安危的大问题，领导人轻易不会对这些问题做出批复。这无异于在鼓励智库学者“出点子”，而不是围绕着决策层的重大需求，“出思想”、“谋战略”。另则，为了追求“获批”的概率，不排除个别学者揣摩上级意图，甚至为了引起领导人的注意不惜故弄玄虚，其中一些缺乏客观分析报告难免会误导领导人的科学决策。

综上所述，“智库研究”和智库学者最为重要的职责是出谋划策，但它所谋划的并非是一般的小点子、小主意，而系事关国家发展或安危之大谋略、大计策。展望中国非洲问题“智库研究”的前景，理想的状态是：担负起中国在非洲活动内外环境变化的“瞭望者”，中国对非战略与政策的“谋划者”，中国“走进非洲”及利益维护的“建言者”以及中非关系可持续发展的“监督者”等多重角色。这就要求智库学者要急国家之所急，思决策者之所想，甚至还要思决策层所未想，及时提供具有针对性、前瞻性和储备性的战略思维和对策建议。

## The “Think – tank Research” of Africa in China: History, Effects and Problems

*Zhang Hongming*

**Abstract:** The “think – tank research” of Africa in China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mid – 1950s. Although the concept of think – tank or think – tank research was not thoroughly shaped at that time, studies on theories and policies regarding Africa in China had already shown the feature of “think – tank”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and corresponding Chinese research institutes had played and functioned the role of “think – tank” ever since. Throughout the past 6 decades, the development of “think – tank research” in China had experienced periods of start – up, frustration and prosperity. Due to the fact that “think – tank research” in China have been driven by the demand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eir evolution history is therefore regarded as a significant parameter for Chinese foreign policies regarding Africa, Sino – African relations as well as the role and status of Africa in Chinese strategies in different times. In line with the definition of “a new type of think – tank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think – tank research” in African studies, which have indeed ushered in a new era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are still at an initial stage facing various challenges. A review on the evolution of “think – tank research” in African studies would be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clarifying some basic problems and periodically evaluating the relevant work so as to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future. Undoubtedly, due to various obstacles and restraints from current political and research mechanisms, there are a lot of difficulties for “the think – tank research” in a short term.

**Key Words:** “Think – tank Research” in China; African Studies; Effects; Problems

(责任编辑:詹世明 责任校对:樊小红)